

中國近代史散論

李佩著



李侃著

中國近代史散論

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钱月华

封面题字：唐雪渔

中国近代史散论

李 侃 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75 印张 209,000 字

1982 年 4 月第 1 版 1982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9,000

书号 11001·460 定价 0.91 元

题 记

这里所收的十二篇文章，是我近二十年来陆续写成的。说是二十年，其实真正从事工作和学习、写作的时间总共也不过十年。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十年大动乱期间，学术研究已经成为一种“罪过”。那时候我对于写研究历史的文章，几乎连想也没有想过。十年浩劫象一场恶梦似的过去了，留下来的除了可怕和痛苦的记忆之外，还有已经总结和有待总结的沉重教训。粉碎“四人帮”，我们的人民和社会主义祖国获得了新的生机和希望，我也又对荒疏了十年的中国近代史重新开始了学习和研究。也许是因为虚度年华而产生的一种急切感吧，在七十年代最后三年里所写的东西，在数量上竟占了这本小书所收文章的一半以上。

我接触中国近代史是从1959年开始的，由于工作或者说由于职业的关系，我不得不贪婪地读一些有关中国近代史的书籍，以补救我因为缺乏历史素养而给工作带来的一些困难。这样，很快地我就对这门学科发生了兴趣。我感到如果不了解中国历史，特别是不了解中国近代史，也就不能真正了解中国社会，从而也就不能更深刻地了解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特点。对我来说，研究历史完全是个新兵，真正可以说是边干边学。在工作和学习过程中，自己认为有所心得，就练习着写出来，不用说，有不少是“未出厂”的废品。就是发表了出来，恐怕也只能算是学习笔记一类的东西，距学术论文的要求相距甚远。只是随着祖国科学春天的到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真正得到贯彻执行，加上一些同志

的鼓励，我才敢于不揣鄙陋和浅薄，把这些不成熟的文章汇集出版。

经过十年大动乱、大灾难之后，痛定思痛，面对着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再回过头去看中国近代历史和近代社会，我觉得有许多问题需要重新研究和重新认识。如果条件允许，我还准备在这方面继续做一些研究和探索。

收在本书中的文章，除《对宣统政局的若干考察》外，都在报刊上发表过。前面的九篇基本上是属于思想史方面的，后三篇则是属于政治史方面的。其中关于《校邠庐抗议》的一篇是和龚书铎同志合写的，感谢他又在百忙中为这本小书校阅了全部文稿，并且改正了一些引文的错误。至于文章的内容除少数几篇略作文字上的修改以外，大都保留原样。

李 侃

1980年4月15日于北京东郊

目 录

题 记	1
鸦片战争前后“士林风气”的变化	1
论魏源	20
论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封建顽固派	48
五四运动以前五十年间中国知识 分子所经历的道路	75
戊戌变法时期对《校邠庐抗议》的 一次评论	119
中国近代“儒法斗争”驳议	132
梁启超史学思想试论	159
鲁迅与辛亥革命	181
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旧课题和新启示	194
农民战争的高峰和天京的悲剧	210
义和团运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237
对宣统政局的若干考察	250

鸦片战争前后“士林风气”的变化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折点。在这个历史的转变时期,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都开始发生变化。作为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并为其服务的思想文化,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以鸦片战争失败为契机,随着中国封建主义思想在与外国侵略者较量中的败阵,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艰辛曲折、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对于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封建士大夫思想变化的情况,作一些探讨,是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必要课题。

一

龚自珍在1839年写过这样一首诗:“河汾房杜有人疑,名位千秋处士卑。一事平生无齟齬,但开风气不为师。”表面上看,这首诗是有感于王通和房玄龄、杜如晦的事迹,借以抒发作者自己的感慨和心愿,但实际上则是对当时社会政治表示不满,要求改变现状而发出的呼声。龚自珍在这里提出了“开风气”的问题,并把这当作自己的抱负和责任。他所要开的“风气”,就是当时通常所说的“士林风气”。但它的内容,却不仅仅限于封建士大夫的学术思想和作风,而是包括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和社会风气。那么当时的所谓“士林风气”又是怎样一种状况呢?

在鸦片战争以前的将近半个世纪中,清朝的封建统治已经腐

败不堪，整个社会呈现出一幅生产停滞，经济衰败，政治昏暗，万象萧疏的残破景象。这种经济衰落和政治腐败的现实，反映在思想文化领域，则表现为一种死气沉沉、万马齐喑的局面。龚自珍渴望打破这种局面，在封建士大夫中间开拓一种新的“士林风气”，以便给濒于僵死的封建制度的肌体注入一些新的思想血液。

说到“士林风气”，早在龚自珍以前，就有一部分封建士大夫关心这个问题了。随着“康乾盛世”的消逝，为清初封建统治者的“文治武功”作点缀装饰而盛行一时的汉学，亦日渐走向末路。这个曾被誉清代学术史上有着光辉业绩的学派，在封建统治阶级的“内忧外患”面前，日益显露出它的陈腐和无用。尽管他们中间一些严肃的学者，在整理古代文献典籍方面作出了很大的成绩，但是那种建筑在脱离实际基础上的学术业绩，对于挽救封建统治的危机却无能为力。学术总是为一定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服务的，封建统治阶级向来是把学术当作维系“世道人心”的工具。“汉学”，从表面上看似是与政治无关的“纯学术”，但这种以脱离政治为特征的“汉学”，恰恰是为清朝统治者所需要，而且是清初大兴文字狱以后学术思想的畸形发展。以训诂考据解经治经的汉学家，不但几乎垄断了鸦片战争以前一个长时期的清代学术界，而且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又经过科举考试进身于官场，往往是学者兼官僚，一身二任。这就形成了一股相当强大的政治势力和思想势力，在“朴学”和“经学”的标榜之下，给士大夫们造成了无形的思想枷锁。大多数的地主阶级的学者和知识分子，都把时间和精力消磨在文字训诂、名物考据，以及八股词章之中，而对于国计民生、时事政治不闻不问。当着封建统治相对稳定，社会阶级矛盾尚未十分激化的时候，它还可以起到为清朝统治者装潢门面、粉饰太平的作用，而到了封建统治面临危机的时候，它就一筹莫展、毫无用处了。因此，在鸦片战争以前的几十年中，有一些对清朝的政治腐败感到不满、要求

改变现状的士大夫，在他们探究导致清朝统治衰落的原因时，就往往把抨击的矛头指向汉学。潘德舆说：“数十年来，承学之士，华者骋词章，质者研考据，……风尚既成，转相祖袭，牢不可诘，天下之士，遂真以食色为切己，廉耻为务名，攫利禄为才贤，究义理为迷惑，而官箴玷、民俗薄、生计绌、狱讼繁，百害籍籍，乘此而起。”^①与潘德舆同时的沈垚也说：“乾隆中叶后，士人习气，考证于不必考之地，上下务为相蒙，学术衰而人才坏。”^②而在封建学者当中，对汉学攻击得最猛烈的则是桐城派的方东树，他专门写了《汉学商兑》一书，对清代的许多“汉学大师”逐个抨击。他说：“汉学诸人，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笈，证佐数百千条，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徒使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他甚至把汉学比做洪水猛兽和杀人毒药：“今汉学家首以言理为厉禁，是率天下而从于昏也。拔本塞源，邪说横议，较之杨墨佛老而更陋，拟之洪水猛兽而更凶。”“宋学之虚，如饮菽水之汁，汉学之实，如饱乌头附子，鸩酒毒脯，裂肠洞胃，狂吼以死而已。”^③对汉学和汉学家表示了深恶痛绝的态度，认为汉学是毒人害政的祸根。

当时，这些士大夫们抨击汉学，决不仅仅是学术上的争论，而是有着更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的。这些士大夫目睹当时社会风气的败坏，官场的黑暗腐朽，痛感“士林风气”对“官场风气”的恶劣影响，因此他们又很自然地把抨击汉学和揭露官吏的贪黷昏聩联系起来。沈垚对当时社会风气的败坏，抨击得更为猛烈，他愤愤写道：“今日风气，备有元、成时之阿谀，大中时之轻薄，明昌、贞祐时之苟且。海宇清宴，而风俗如此，实有书契以来所未见。”^④他认为清朝

① 《晚醒斋随笔序》，《养一斋集》卷十八。

② 《与孙愈愚》，《落帆楼文集》卷八。

③ 《汉学商兑》卷中之上、卷下。

④ 《与张蕲甫》，《落帆楼文集》卷八。

统治下的社会风气已经坏到了极点，简直是集中了历史上西汉末期、北宋末期和金朝末期的那些亡国之象，兼而有之。他还以留居北京期间的切身感受，揭露当时的社会风气和官场腐败情形说：“都下无一事不以利成者，亦无一人真心相与者”，“居都下六年，求一不爱财之人而未之遇”，①“都下衣冠之会，无有一人言及四方水旱者，终日华轩快马，驰骋于康庄。翰林则谒拜阁师，部郎则进谒台长，公事则胥吏持稿，顾名画诺，私退则优伶横陈，笙歌鼎沸，其间有文雅者，亦不顾民生之艰难，惟有访碑评帖、证据琐屑而已！”②这种恶浊的“士林风气”和官场恶习，使得一部分士大夫痛心疾首，满怀忧虑。这些抨击汉学鄙陋，揭露官场腐败的士大夫们，大都以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者自命，他们虽然看出了汉学的无用，和它的恶劣影响，并给它加上了严重的罪名，但是他们不可能从本质上打中汉学的要害。这是因为：一则他们颠倒了意识和存在的关系，完全离开封建制度本身，孤立地把汉学看成是万恶之源，而不懂得所谓“汉学”和“士林风气”的败坏，是腐朽的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二则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抨击汉学的时候，自己也拿不出什么新的思想武器，只好搬出程朱理学这个同样陈旧腐朽的武器向汉学进攻，大捧程朱，高唱义理，以宋反汉。这当然也同“汉学”一样，无济于事。

所谓汉宋之争，实质上不过是在尖锐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冲击下，地主阶级内部关于汉学和宋学那一个学派能更有效地为地主阶级的政治服务的争论。所谓宋学，它讲的那一套心性义理、修齐治平的说教，虽然为清初的统治者所提倡，但是由于它的虚伪脆弱，并没有流行多久，而且早就被汉学家鄙弃讥讽为陈腐空疏的东西。宋学企图在汉学衰落之中打个“翻身仗”，但是它本身

① 《与张渊甫》，《落帆楼文集》卷八。

② 《与许海樵》，《落帆楼文集》卷九。

也已在没落。不论汉学和宋学，都成了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它们虽然都要顽固地留在思想阵地上不愿退走，可是彼此都失掉了战斗的能力，那种表面上也颇为激烈的所谓汉宋之争，其实不过是两队残军的空喊鼓噪而已。

清朝的封建统治越来越腐败，社会危机越来越严重。本来就是文恬武嬉、麻木昏聩的统治机构，民穷财尽、百孔千疮的财政经济状况，再加上鸦片流毒的加剧，就使得清朝的统治更加腐烂。士大夫们攘臂张目、喧闹不休的汉宋之争，对于挽救清朝统治的危机，已经成为“可怜无益费精神”的空喊。于是，历史又把一批地主阶级的进步思想家推到时代潮流的前面，他们以比前辈士大夫们更加激烈的姿态，揭露和鞭挞封建统治的腐烂肌体，寻求挽救垂死的封建制度的药方。这就是以龚自珍、魏源等人为代表的一批人物。他们虽然也都是从旧营垒中来，并且深受经学的熏陶，但是时代推动他们从训诂考据的圈子中挣脱出来；他们也抨击汉学，但是却并不依傍程朱；他们也讲经学，但是却不迷恋往古。他们服膺今文经学，目的是为了“经世致用”。这些人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以“开风气”者自命，他们无情地揭露、抨击甚至诅咒封建“衰世”的腐败。龚自珍说：“承乾隆六十载太平之盛，人心惯于泰侈，风俗习于游荡，京师其尤甚者。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①封建统治的危机已经如此严重，但是却没有什人，也没有什么办法来挽救这种危机。因为封建的“衰世”已经到了“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阍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衡无才商”的地步，从上到下，朝野内外，人才枯竭已达极点。即使“有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②，而那些“百不

① 《西域置行省议》，《龚自珍全集》第一〇六页。

② 《乙丙之际著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第六页。

才”扼杀人才，不是用刀锯水火，而是弥漫于朝野上下的腐败风气。这种“至极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使得人们思想僵化，苟且因循，是非混淆，善恶颠倒。结果必然造成“生民嗷类，靡有孑遗，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①的境地，而终于“丧天下”。他还进一步揭露当时封建官场的腐败情形说：“窃窥今政要之官，知车马服饰、言词捷给而已，外此非所知也；清暇之官，知作书法、赓诗而已，外此非所问也。堂陛之言，探喜怒以为之节，蒙色笑，获燕闲之赏，则扬扬然以喜，出夸其门生、妻子。小不霁，则头抢地而出，别求夫可以受眷之法。”“今上都通显之聚，未尝道政事、谈文艺也；外吏之宴游，未尝各陈设施谈利弊也。其言曰：地之腴瘠若何？家具之赢不足若何？”^②追求利禄，阿谀逢迎，搜刮地皮，贪污肥己，已经成为官僚士大夫们政治生活和物质生活的主要内容，正是这种状况，形成了封建“衰世”的不治之症。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士林风气”和官场风气如此败坏呢？龚、魏以前的一班士大夫往往把它归咎于汉学，荒谬地认为，只要用程朱理学去代替汉学，就可以改变“士林风气”的腐败。他们的这种不切实际的迂腐之见，当然只能是一堆废话。

龚自珍、魏源比他们以前或同时的士大夫们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们在揭露“士林风气”和吏治的腐败时，敢于从清朝的统治本身去寻找原因，而不再纠缠于汉学和宋学的得失优劣。他们不但敢于揭露黑暗的现实，而且大胆地指出造成这种黑暗现实的就是清朝统治者。龚自珍在《古史钩沈论》中，痛责清朝统治者“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积百年之力，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既殄、既殍、既夷，……一旦责有气于臣，不亦暮乎？”^③魏源指出：“历代亡天下之患”有种种不同，

① 《平均篇》，《龚自珍全集》第七八页。

② 《明良论》一、二，《龚自珍全集》第三二、三〇页。

③ 《古史钩沈论》一，《龚自珍全集》第二〇页。

其中最危险的是“鄙夫”当权，因为“鄙夫胸中，除富贵而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材为何物；所陈诸上者，无非肤琐不急之谈，粉饰润色之事；以宴安鴆毒为培元气，以养痍貽患为守旧章，以缄默固宠为保明哲，人主被其熏陶渐摩，亦潜化于痿痹不仁而莫之觉。岂知久之又久，无职不旷，无事不愆。”^① 龚、魏的这些议论，当然都是针对清朝统治者而发的。

清朝统治处于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危机之中，龚自珍等人预感到本阶级的末日即将来临，一场时代的大风暴已不可避免。他们在苦闷和憎恶中为封建制度唱起挽歌，希望有一场风雷来涤荡“衰世”的恶浊，但是他们呼唤的却不是资本主义的明天；他们憧憬着有一个新的未来，但是这个未来是个什么样子，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因为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条件和他们的阶级地位，限制了他们的思想和眼界。龚自珍提出“开风气”的强烈愿望，表示他不甘忍受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但他又无法冲破这种束缚；他发出了“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喊，但是在地主阶级中却不可能产生区别于封建士大夫的新型“人才”。

就在龚、魏等人感叹“衰世”，寻求药方，企图为医治病入膏肓的封建制度而进行探索的时候，一场农民革命的大风暴正在酝酿。可是，在这场革命的风暴还未到来之前，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英国侵略者的鸦片和大炮，威胁着古老中国的独立和生存，时代和历史又为中国人民提出了全新的斗争任务，同时也为封建士大夫们提出了崭新的课题。

二

反对英国侵略的鸦片战争，是对清朝统治的政治、军事、经济

^① 《默觚下·治篇》十一，《魏源集》第六六页。

力量和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精神状态的严峻考验。富于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在凶恶的外国侵略者面前，毫无畏惧，奋起反抗。广州三元里人民和东南沿海其他各地人民的抗英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英雄气概，开始谱写了中国人民一百多年以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斗争的光辉篇章。

鸦片战争期间，由于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暂时退居次要地位，因此那些平时关心国计民生、抱有“经世”之志的官僚士大夫，都直接间接地投入了反对英国侵略的斗争。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身分，在广州人民的支持下，申张正义，在虎门滩销毁了污辱和毒害中国人民的大量鸦片，并且一度领导了反对英国侵略的鸦片战争。龚自珍在他逝世的前二年，曾写信给林则徐，表示了坚决抵抗侵略的意志。魏源参加了抗英将领裕谦的幕府。姚莹在台湾组织领导了台湾军民的反侵略战争。在战争期间，一些封建士大夫所关心的再不是什么汉学、宋学、八股词章，他们所议论的主题，乃是怎样对付侵略者的“御夷之策”了。

对于多数封建士大夫来说，这次战争来得太突然、太不可理解了。他们作梦也未料到远隔万里重洋的“英夷”，会那样耀武扬威地在中国东南沿海横冲直撞。而在战争过程中，一些官僚士大夫们震惊之余，又看到了两个明显的事实：一个是清朝文武官吏的无能和军队的极端腐败；另一个是英国的船坚炮利和中国武器技术的落后。对于前一个事实，连一些守旧的官僚也不能再加掩饰了，江南道监察御史骆秉章密奏说：“查靖逆将军自抵粤以来，不问军旅之计作何整顿，地势之谋作何防堵，以及运筹决胜之策，折冲御侮之计，一无所出。惟知爱购钟表，喜买呢羽而已，惟知供应丰盛，养尊处优而已。如孩提之情性，作稚子之行为……。”^①这就是清

^① 《骆文忠公自订年谱》。

军统帅奕山在战争前线的所作所为。大理寺少卿金应麟在讲到镇江失守时的情形说：“文员怀印而逃，以投池为故套，武弁弃城而溃，以退守为自全，问敌情则茫乎不知，闻讹言则各自奔散，纪纲不立，号令不行，虽百万之师，终归无用。”^① 这些奏报，真是活画出了一幅“文官爱钱而又惜死，武官惜死而又爱钱”的丑恶狼狈的状况。

士大夫们对清军的腐败、各级官吏的贪生怕死揭发得淋漓尽致，那末他们自己的思想状态又是怎样呢？应该说，他们主观上对那些腐败官僚是很愤恨的，也想在反侵略战争中有所建树，但是他们的这种主观愿望在客观事实面前，却事与愿违、枉费心机了。长期以来，清朝统治者所推行的禁锢思想、文化专制、固步自封、闭关自守的反动政策，使得那些平时熟读经书、醉心考据、善作八股，或自命深明义理、热心修齐治平之道的官僚士大夫们，到了十九世纪中叶，竟闭塞愚昧到连圆形的地球以及起码的世界地理、历史知识也不知道，对于当时的世界形势简直是漆黑一团。他们中间的许多人，直到英国侵略者闯进了中国的大门，并且打败了清朝军队以后，这才开始知道，原来世界上除了“天朝”之外，还有什么英吉利、法兰西、弥利坚等等这些莫名其妙的国度。在他们视为无所不包的《四书》、《五经》和他们悉心考据的名物制度中，从来也未看见过什么轮船洋炮等等这些怪物。可是以“忠孝立国”、“深仁厚泽”的“天朝”，竟被“不闻礼义”、“嗜利狡诈”的“英夷”打得狼狈不堪。严酷的现实，迫使一些士大夫们不得不正视“英夷”这个前所未遇的敌人。然而，除了孔孟经书讲的那些教条以外，他们再也没有别的什么思想武器了。因此，他们只能用所谓“华夏夷狄”的老观点，去看待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重复那些“华夷之辨”、“冠履之分”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四十一，第一五四六——一五四七页。

的陈词滥调。然而这些说教在“英夷”的坚船利炮面前又有什么用处呢？他们面临的实际问题，乃是怎样去对付“英夷”的“长技”。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虽然挖空心思，但终究还是智穷力竭了。

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和他们的近代科学技术，在当时中国的士大夫的心目中，完全是陌生的存在。且看他们是怎样认识“英夷”，又是怎样对付“英夷”“长技”的吧。骆秉章说：“闻该逆兵目，以象皮铜片包护上身，刀刃不能伤，在粤时，义民以长槌俯击其足，应手即倒。”^①另一个官僚吕贤基除了主张用砍脚的办法制胜而外，还提出了如何对付敌人步枪大炮的办法，他说：“且逆夷鸟枪，其火不燃自炽，最易伤人。惟以藤牌俯伏御之，则弹丸自牌上闪过，不致被伤。至于避大炮之法，亦惟全身俯地，待其炮声既尽，起而与之决战，靡不克矣。”^②他的制胜妙法，就是用藤牌防枪弹，用伏地避大炮。陆战如此，海战又怎样呢？广西道监察御史蔡家环说：“盖英夷之所恃者，其船大，其炮猛，人必以是为难制。而不知我正幸其船之大也，船大则驾驶不灵，非风不行矣。更不畏其炮之猛也，炮猛则不能近击，不能低放矣。”^③可见这些官僚士大夫对“英夷”及其“长技”几乎毫无所知，而他们提出的那些御敌之法，也近于痴人说梦。对于“英夷”的“长技”以及敌我双方武器的对比，了解得比较具体的，倒是投降派首领人物之一的耆英。他向道光皇帝奏报说：“彼之长技，在于火炮火箭二项，……用测远镜窥定高下远近，号令施放，故能发无不中，火箭即随炮飞来，延烧甚烈。我之炮力，本不能如彼炮之致远，……彼炮可以连环接续，而我炮止有一发，发而不中，等于无炮。”^④不过耆英强调“英夷”武器的厉害，目的不是为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三十六，第一三三九页。

② 《平夷要务疏》，《吕文节公奏疏》卷一。

③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十七，第六〇〇页。

④ 《史料旬刊》第三十五期，第二九一——二九三页。

了设法抵抗，而是为其妥协投降制造借口。一些官僚士大夫们轻视“英夷”的“长技”，是由于无知；耆英强调“英夷”的“长技”，是由于畏敌。无知和畏敌，都是清朝统治阶级腐朽没落的表现。

另外，也还有一些封建士大夫，他们一方面承认“英夷”确有“长技”，另一方面也在想方设法去抵御和对抗这种“长技”。为此，他们纷纷提出“御夷”的具体办法。但是，由于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近代科学技术，当然也就不可能提出行之有效的措施。这些士大夫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提出了“火攻”战术。吏部左侍郎杜受田奏称：“逆夷……处处恃火炮之利，以为无敌，而不知以火制胜，亦必将以火取败”，“夷船坚大，师船不足以御之，惟有火攻一法，乃彼所深畏。”^①至于“火攻”的具体办法，也有多种多样。有的建议用一种特制木筏，上面堆上湿草，草上挂上湿牛皮，以防敌人炮火，木筏上装载引火之物，使其接敌放火。有的建议用许多小船，从四面八方方向敌船逼近，使敌人“四面皆船，欲放炮而无从下手”，这些小船在接近敌船之后，就可以放火将敌船烧得“片板无存”。他们在献出这种种“火攻”妙计的时候，还往往援引一些古代的火攻战例为依据，说什么这是周瑜、诸葛亮在赤壁火烧曹操的战法呀，是岳飞在洞庭湖大破杨太用过的战法呀，说得神乎其神。其实这正好说明，他们是想用千百年前打仗的方法来对待近代的反侵略战争。当时中国的社会制度停留在古代，科学技术停留在古代，封建士大夫们的思想也同样停留在古代。

除了“火攻”之外，也还有人提出用类似“木马计”的办法克敌制胜。金应麟的计策是：“白夷最贵，所嗜牛羊鸡鸭鲜果之属，到处皆须接济，……而接济之人，以送物之故，在舟留饮。夷人恃有犀革，能耐刀箭，两腿软弱，一击即倒。如有附近居人，以送物为名，上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五十六，第二一八一——二一八二页。